

文化与哲学的力量 ——反对文化霸权、推动新时代文化的思考

东方毅*

【摘要】从文化产业企业家的视角看，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必须国家有力量。这种力量以经济力和国防力为前提，文化力为引领。文化力由“人心”加智力组成，其中“人心”既是标识性的中国话语又在文化力中具有战略性意义。习近平同志讲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力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面临三个最紧迫的问题：中华文化的内部认同、宗教传播对中华文化的消极影响、教育领域的功利化现象，都与“人心”缺少力量有直接关系。解决“人心”的力量问题需要哲学方法论指引。对于中华文化内部的不认同，首先要建立扬清去浊的坐标体系，其次要确保两个基本逻辑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现实的价值评价体系与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统一。对于化解新一轮宗教传播对中华文化的消极影响，要坚决打击非法传教，努力融通和挖掘各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使合法宗教活动成为强盛中华文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对于教育领域的功利化现象，要以集体主义确保教育不能被扭曲，要以“小我”的习武、崇文、可和平，促进“大我”的经济力、国防力和文化力。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人心”里，中华文化才能助力中国崛起，才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中华文化力；中华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学界和民间结合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思想追求越来越一致，目标也越来越集中地指向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共同发展以及国家和民族眼前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

* 东方毅，东方毅文化协会会长，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

该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如何面对各式各样的“文化帝国主义”^①的霸权和欺凌，如何维护好文化安全乃至国家整体安全并实现长久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各行各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鼓舞和引领，如何在率先满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需要的同时，又为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提出了崭新的方法论要求和“力量”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涉及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哲学问题。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文化融合与竞争中如何以自己独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力量优势为人类文明引导方向，挽世界文化被文化帝国主义侵袭之狂澜于既倒，是文化理论界及与文化相关的所有政府和民间文化力量乃至全体中国人的重大历史责任。

一 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笼罩下的中华文化安全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帝国主义时代，以美国为首的文化帝国主义者认为：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正在酝酿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冲突。他们认为，基督教文明是上等文明，中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劣等文明，基督教文明应该在全世界开花结果，而其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此，他们主张西方文明应该联合起来，对付东方文明。当前，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伴随着金融帝国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大量输出其政治价值观，并大肆践踏别国的文化价值。

（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

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在外部表现和内在动机上呈现出巨大差异。其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亚非拉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列宁所描述的以侵略和殖民来攫取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行径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世界的财富迅速增加，金融帝国主义攫取利益的野心急剧膨胀，但由于世界文明的进步，其攫取利益的手段也不得不更加巧妙和隐蔽。

1. 文化帝国主义的目标

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目标不同于旧的军事殖民帝国主义，它并不是要直接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而是通过文化输出控制他国人民的心灵，涣散他国人民的斗志，以此从观念上影响人，感情上俘获人，心理上控制人，改变他国人民的价值观和思

^① 参见〔德〕伯尔尼德·哈姆、〔加〕拉塞尔·斯曼戴奇《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曹新宇译，商务印书馆，2015。

维方式，最终不费一枪一弹，改变、掌控、分配世界石油、天然气、矿藏和其他资源乃至整个全球财富的归属。

放眼世界，中国已经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方进入金融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视线。帝国主义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唯恐强大的中国会挑战它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但它也不希望中国过于贫穷，这样它就无法把中国变为它的庞大市场和世界工厂。因此，一个分裂的、无力的、没有斗志的中国是新帝国主义最希望看到的。

资本主义的逻辑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形态下的资本逻辑是将市场、国家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成功运用“奶头乐”文化，开始逐步成功实现其在世界大部分范围内的文化统治。它鼓励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破坏全球的就业和生态系统，加剧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痛苦与绝望，把巧妙的、潜藏着危险的、严酷的丛林法则式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它通过文攻武吓，疯狂地控制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图谋达到重塑被压迫国家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它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陷阱让我们入围，只要我们接受它的思想和理论，我们的大脑就会按照它的实际来运转。

2. 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的文化现象

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潜入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的。美国号称完备的法学、哲学体系，号称科学的管理模式、经济理念，早已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潜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课程的讲堂和教科书以及许多研究机构。商品经济、科技进步、开放社会、政治民主、个性张扬等，不知不觉使人们把形而下的世俗过程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日新月异的生活不但没有使人们保持世俗与精神理想追求之间的平衡，反而，湮没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人们忙忙碌碌、急功近利。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支配了人，挖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上一度充斥着错乱嘈杂的声音。汹涌而至的消费主义占领了中国人的头脑，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感官上的短暂愉悦。大众传媒进一步激发了这种集体狂欢，在精日、哈韩中潜滋暗长出矮化、分化中华文化的软骨病。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的东西又死灰复燃，非法传教组织也盯上了中国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精神生活乏力的短板，乘虚而入，抢占国人的文化地盘。消费主义、性自由、精致利己主义的成功学成为消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毒瘤。

总之，文化帝国主义谋略的实质在于用看不见的手达到枪炮达不到的目的。它们急切地想要我们抛弃传统，自己否定自己的过去。它们极力想要同化我们的性格，压抑我们的民族精神，贬低我们的文化。这是一场文化领域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二) 维护中华文化安全需要国家力量

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力量是裁判。没有力量，中国将任人宰割。只有

有力量，才能有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没有力量，一味强调声东击西，或交或攻，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或投机取巧。拥有力量，才能讲宏韬大略，离开力量讲韬略，犹如水月镜花，只能是空喜一场。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看，有史以来，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追随力量走路的。有力量，就能吸引大批的从者，就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亦能对对手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只有中华整体有力量，我们才能维护好中华文化安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才能在世界的发展中不断贡献出包容和促进之力。

1. 国家力量的构成

国家的力量由国防力、经济力、文化力共同组成，三者缺一不可。绝不能将经济力简单等同于国家力量，而是要以智力来充实，以国防力为后盾，以人心来补充。

经济力很重要，它和其他两种构成国家力量的要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经济力强大，就能为国防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国防力也会大增，文化也会更具有吸引力。但倘若经济力不足或经济动荡，民心不稳，在处理国家与国家间事务中就容易没有底气，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牢牢地把握经济安全不断促进经济力的强大，使其成为国家力量中强大的基础支撑。然而经济力固然重要，仅有经济力也是不够的。比经济力更重要的是国防力。

在国防力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力不可谓不高，但依然难逃被世界列强掠夺的命运，其武力的落后和清政府内部的腐败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国界还没有消失的当代，国际关系的主体依然是主权国家，国家的武力是否强大，是保障国民人权的基本前提。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只有不怕打，才能避免打。在汉字的结构中呈现出的“武”字的真谛，在于止戈，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多数的战争，无论是寄希望于结束战乱的统一战争，还是对付来犯之敌的保卫战，都需要以武力来预防、威慑和终结。

在国家力量中，比经济力和国防力更有引领意义的是文化力。文化力是一个民族思想与现实碰撞产生的精华，来源于长期的实践和长久的历史积淀，文化力具备强大的再生能力，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只有文化力能够引导人民拒绝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妥协；只有用文化力才能开展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和日常生活的批判；只有以文化力为纽带，经济力和国防力才能相互配合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逻辑纽带；也只有以文化力为国家力量的核心，我们才能最终形成民族复兴和为世界贡献智慧的伟大力量。

2. 文化力的构成及核心地位

在文化产业界的企业家看来，文化力由智力与人心构成，这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力量；作为战略力量的重要因素，相比较而言，人心的凝聚有着更加能动和积极的首要意义。在文化争取人心、凝聚力量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承认，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注该问题较我们早，研究较我们深。早在1990年，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中体现出的力量以战略地位加以标注，把它提高到足以领导世界的高度。他们虽未使用“人心”一类的话语，但其所重点描绘的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说的正是中国人在文化力问题上最为关注的焦点——人心问题。

当前构建中华文化力中最需要调动的力量也正是人心。尽管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紧密相关的是国民的智力，但是，从国家建设的根本目的看，文化力最关注的战略核心依然是人心，这就是人的信心、信任、信仰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力量”，“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再一次从理论判断和实践导向的角度准确论证了人心与国力的关系。把人心作为文化力的核心，不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社会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我们在文化力问题上最有标识性的中国话语。相应地，在由经济力、国防力、文化力组成的中华力量构成中，用文化力引领国防力和经济力，用经济力和国防力辅佐文化力，也就成为国家力量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最直接的辩证关系。

3. 产业界在打造国家文化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作用

我们民间文化协会等文化产业界所做的，正是用财力来辅佐精神生产，以精神生产来引领和促进更有力的经济、国防的工作。这不仅是文化产业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最好状态，同时也是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劳动群众在生产活动中为强大国家力量发挥作用的最好状态。

国家文化力的打造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宏大民族精神的文化产业的企业家，他们虽然追求利益，但关心世界的光明前景，追求整个民族的发展大益。他们能立志不断从世界经济价值链的低层，逐步走向高端，为国家积累财富。他们愿意主动逐步加大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主动支持建立人民币的结算地位，主动利用地缘关系充实巩固经济自由贸易区，主动在能源、交通等问题上利用一切办法和手段为国家力量的强大创造有利条件。而这，正是经济力辅佐国防力和文化力，文化力引领经济力和国防力的最好状态。

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

所有的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归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解决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问题需要哲学方法论的力量指引。这种方法论的指引首要地包含了三个关键性问题：如何在中华民族内部达到文化认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正确处理西方文化以及新一轮的宗教传播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如何突出教育在强盛文化力当中的决定意义。

（一）努力解决好中华文化的内部认同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下我们有共同的指导思想，但在指导思想与时代个体的结合和磨合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交织中，整个社会还需要一个明确的文化元起点作为形成共识的基准坐标。

1. 建立文化认同的坐标系

解决好文化认同的坐标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当前中华文化的不同究竟出自哪里。是出自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结合的内部，还是产生于中华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冲突？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困惑，还是传统美德的完全丧失？只有在纵向的时间场域和横向的空间场域进行清醒的比较，我们才能在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明确哪些是该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哪些是该抛弃的文化糟粕，从而引领整个中华民族找到真正的中华文化认同。

其次，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内在的统一。“修齐治平”的家国理念和“大同世界”的伟大梦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念有着极为相似的指向联系。“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和流传千年的“民本”“德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保持了心有灵犀的默契。在道德境界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求都是高远的；在自然规律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一致之处。

最后要正确评价资本主义文化带给中华文化的影响。资本主义文化追求的利润最大化给自然界的可持续性带来极大的破坏，个人主义成功学和性自由造成人与人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的紧张和迷茫，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崇尚利己的人。当前资产阶级的文化逻辑已经无法解释和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即便是宗教也越来越无法弥补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的裂隙。资产阶级文化逻辑所导致的，一方面生产的极大浪费与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愈演愈烈。

只有当我们把文化同时置于古今中外的横向和纵向对比中，甚至是交叉对比中时，我们才会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我们该留下的，什么是我们该抛弃的。那些体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境界相一致、自然观相一致的地方，就是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并且应该作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共识，那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裹挟到中国的体现人性和人际关系发展历史倒退的潮流，就是我们该丢掉的文化垃圾。

2. 寻求文化认同的两个基本逻辑统一

如前所述，寻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中华文化认同的第一个基本逻辑，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文化根基决定的，任何割裂二者一致性的做法都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背离。当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还需要一定的总结和梳理，甚至是用时代的话语重新诠释和输出，这是一个浩大工程，然而和这个浩大工程相比，中华文化认同还有一个更为重

要的基本逻辑要求，那就是必须要创建一个与上述文化一致性相对应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

如果在现实的价值评价体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致性的人们总是得不到正性评价，反而是把正性评价给了割裂二者一致性甚至是在实践中遵循资产阶级文化价值的人，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也更无从谈起。但反过来说，只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价值理论与价值评价实践相统一的两个基本逻辑根基，就一定能在文化自信问题上实现先进文化的率先垂范；在文化自觉问题上实现把先进思想转变为大多数人的普遍行为；在文化自主问题上牢牢把握历史的机遇和脉搏，建立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根基的中华文化认同，从而在中华文化认同中实现中国力量。

（二）处理好新一轮的宗教传播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合理性和社会历史意义。从历史上看，宗教的产生源于对不可抗力的恐惧。人类灵魂的深处，潜藏着一种恐惧，当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能抵抗这种恐惧时，唯有寻求宗教的庇护和慰藉。从现实的角度看，宗教在中国的新一轮加速度传播源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们灵魂深处的寂寞以及所需要的精神皈依。这些广泛新增的信众有很多起初并非被教义吸引，而是偶然得之，比如圣诗好听，宗教故事好看，教会组织的活动好玩，甚至是受益于教友之间友爱的氛围和情谊，所以很多人尽管最初一知半解，但慢慢地还是进入了信仰的门。

世界三大宗教究其本源来说是向善的，如果处理和发展得当，对社会的运行应该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应设法使宗教信仰成为强盛中华文化力的动力而不是阻力。然而三大宗教在中国展开新一轮传播的同时，一些非法传教组织也借机大肆活动，发展信众，甚至开展地下活动，以达到各种非法目的。这就需要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法律下，严格区分合法的和非法的、正当的和非正当的宗教传播活动。对非法的宗教活动必须严格取缔，而对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则要利用其长处，消弭其短处，使其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助力。

当前在处理好新一轮的宗教传播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尤其要注意二者在更高的精神追求层面上的求同存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能够以更高的水平，更深邃的见解实现对各种宗教的团结统一。

（三）突出教育在强盛文化力过程中的决定意义

教育不仅仅关乎经济，更关乎政治、军事和战略。教育是智力的起搏器和思想的发动机，在强盛文化力的过程中有着确保代际准确传播的决定意义。教育一旦有危机就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因而，教育不能被扭曲，课堂不能被污染，思想不能被功利。

一个民族的教育如果只注重功利，却无民族的向心力，必将成为一盘散沙，霸权将乘虚而入。这就需要教师、家长、社会各界、实业家都识大体，共同追求文化尊严。无论是兴办公学还是兴办私学，都指向民族振兴的同一目标。私学不私，以一己之力，担当一个国民对民族的责任；私学虽私，却以倾国之力，追求一个国家对世界文化的促进与发展。

在教育方法问题上，只要对中华文化力提升有利的就要吸收，对中华民族进步有利的就拿来；而在教育的内容问题上，对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都要有最清晰的把握，不可盲目采用，务必在把握之后再行有甄别地吸收或抛弃。

在教育的对象上，要重塑民族精神，培养国民性，就要教育我们的学生习武、崇文、可和平。文攻武备是一个民族屹立不倒的强大精神支撑。青年人的志向、思想、习性、勇气，将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因此，通过习武强健其体魄，磨炼其意志；通过崇文充实其知识，鼓励其创新；通过可和平的辩证理解实现其坚定的民族意志，是民族精神教育最好的投资回报。

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尽管在当代的中国我们关注的是中华的崛起，但这只是我们长远事业的一个阶梯，我们的长远目标还包括整个人类的共同福祉和利益。这才是“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精神追求。

三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构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构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它指的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不仅体现了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对全球治理的呼唤，也体现出全球治理对联结整个人类的精神力量的紧迫需求。

（一）全球治理呼唤中华文化的参与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我们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行天下，德润世界”与“天人合一”理念相结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我们期待得到全世界的回应和支持，并期望中华文明能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当下，我们正是要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话语，去说服世界和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也就更需要我们让自己的理论或道理更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底，更能说服人。

“道行天下，德润世界”是中华文化绵亘数千年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历经磨难却不曾中断或消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道行天下，德润世界”和“天人合一”的主张符合人性完善和世界包容性发展的要求，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建立良好秩序的需要，因此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道行”“德行”规律的大前提下，各种外来文化才纷纷消融其中。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在当今这样一个资源消耗过度，竞争不断加剧的地球上，西方掠夺主义的价值观已经难以为继。此时整个地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价值指引，此时也正是东方文明为全球治理贡献财富的最好时机。

（二）中国崛起需要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

当中国置身于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之下意欲和平崛起，中华民族意欲实现伟大复兴，并同时致力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时候，我们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为题，召开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研讨会，不仅是面向现实，更是面向未来、面向人类发展的一件大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不是简单重复中华历史上的所谓盛世^①。历史永远不能被重复，甚至不能被模仿。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其包含国际主义的内容。中华民族是民族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中国要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经济、国防和文化都有力量。

中国人必须清楚，条约和道德并不会阻止美国对中国的进攻。美国人所继承的西部牛仔精神，盎格鲁-撒克逊人所遵从并一贯奉行的扩张性战略也会不断表现。美国不会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表态和愿望，他们仍将时时从各个方面围堵中国。鉴于此，中国的崛起只能凭借由经济力、国防力、文化力组成的强大的国家力量。

当前我国的经济力、国防力在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更加大力地提升文化力。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从文化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我们不仅要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我们还欢迎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到中国接受教育，欢迎与世界各国家、各民族进行民间的文化和交流交往，将中华文化建设成一个世界东方强大的磁场，在这里，中华文化将以其开放、多维、外延、创新等特征改变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不断膨胀所造成的文化结构失衡，以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融合西方一些先进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为我所用，将中华文化的声音和力量展示

^① 东方毅 《雄主与拓展论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第83页。

和服务于整个人类。

四 结语

当我们从整个人类的视野谈及文化和哲学的力量时，就会发现，尽管文化体现在个人身上时，力量相对渺小，但一旦体现在一个大国和大民族之上时就会集合成磅礴的力量。中华文化历来注重“小我”与“大我”的积极整合，“小我”的“习武、崇文、可和平”相加，就是“大我”的经济力、国防力和文化力积聚。重视个人生存的文化动力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动力的同一性和一致性，是包含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长期积淀的优秀基因。个人生存的文化动力，源于客观生理需要为基底催生的某种精神信念对于内在生命冲动的抑制、掌握与升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动力则来自一种社会理想、信念和原则把每个人的生命冲动整合为共同的语言和协调的行动^①。在世界呼唤全球治理的时代境遇下，以强大的经济力和国防力为基础，进行中华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内在建构，超越自我所创造的科技文明，将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活的手段，把人文精神和国际主义作为社会进步的内在目标和根本动力，这才是中华文化应该贡献给世界的崇高追求与强大精神财富，它不仅能有效稀释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欺凌，更有益于建立和巩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在中国，这不仅是文化理论界的共识，也是民间文化力量的愿望和期待之所在。

The Power of Culture and Philosophy: Reflections on Opposition to New Cultural Hegemony and Promotion to Practice of Socialist Culture for a New Era

Dongfang Y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y entrepreneurs, to go against the new cultural imperialism, the state must have strength. This strength is based on economic and national defense capability, and is led by cultural power. The cultural power is composed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intelligence. Specificall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s not only a symbolic Chinese utterance, but also has a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ultural power. Xi Jinping said that only if people have confidence the country can have strength. There are three press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ocialist cultural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the internal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e negative in-

^① 东方毅 《雄主与拓展论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第124页。

fluence of religious spread in China , the utilitarianis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ll these problem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ack of power i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 To solve the problem about lack of “will of the people” , it is needed to set up the guide of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Only when integrat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under the “will of the people” , Chinese culture can drive the rise of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by providing China’s wisdom and strength.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Power;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Marxism;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